

晚明学术中心的形成与鄂东学派

方正 程昊卿¹

【摘要】：晚明鄂东是天下春秋学的中心、礼记学的中心和医药学的中心，诞生了李贽的“童心说”，催生了“公安派”；李贽的“童心说”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代表了晚明科技与人文的最高成就，鄂东成为晚明学术的中心。明代中期以后汉口兴盛，带动了鄂东外销型农业的发展，伴随着财富的积累和科举的成功，鄂东出现了一批文化世家。世家大族通过兴办书院，养成学术流派；结社讲学，开展学术交流，出版学术著作，强化学术中心地位。鄂东学术中心的确立，对明清以来鄂东社会、湖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关键词】：晚明 鄂东 文化世家 学术中心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6-0100-06

晚明的起点在哪里？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如果从明代学术思想发展而言，把万历一朝作为晚明的主体部分又是大家一致公认的”¹。若论晚明学术，不得不说李贽的“童心说”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他们代表了晚明科学与人文的最高成就，而成就李贽与李时珍的正是鄂东社会。明中叶汉水改道，汉口兴起，成为湖北最大的市镇，为天下“四大名镇”之首。鄂东五水，倒水、举水、巴水、浠水、蕲水发源于大别山，通过长江与汉口相连。“货到汉口活”，鄂东的农产品通过汉口行销全国，带动了鄂东外销型农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推动了鄂东科举的兴盛，“财富足，则学校可兴”“学校兴而人材出矣”²。伴随经济发展和科举的成功，晚明时期的鄂东产生了一批文化世家，这些世家大族，通过兴办书院和延请名师讲学，鄂东成为晚明学术的中心，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³

一、经济发展是晚明鄂东学术中心形成的基础

鄂东⁴北倚大别，南带长江，东吐鄱阳，西吞云梦，中由“五水”水系把东北部山区、中部丘陵、西南部平原分割成众多条块，数以千计的天然湖泊和人工湖点缀其间。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气候温湿，雨热同期，物产丰富。明中期的鄂东不仅水稻种植业发达，而且经济作物麻桑和棉花种植甚广，渔业、纺织业发达。光有生产的发展还不行，如何把这些货物销售出去是关键。在以人力和蓄力为主要动力的古代社会，水运是最重要的交通方式，特别是对于大宗农产品的销售尤为重要。恰好这一时期，汉口凭借汉水改道而兴。汉口处长江汉水交汇处，顺江而东，可达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循大江而南，过洞庭入沅湘可通两广云南贵州；溯江而上可通巴蜀；溯汉水而上，可入宛洛，所谓“九省通衢”。鄂东五水倒水、举水、巴水、浠水、蕲水发源于大别山，流经东北部山地、中部丘陵、西南部平原，垂直注入长江。五水通过长江与汉口相联，“货到汉口活”，鄂东的农产品可以畅销天下。正因为明代中期，汉口的兴盛，带动了鄂东外销型农业的发展，鄂东黄州府一跃为全国的上等州府。天顺初年及嘉靖、隆庆年间湖广布政使司19个府州的里数及估计户数黄州府第一⁵。无论《大明一统志》还是《读史方輿纪要》，明中叶时，黄州府的人口为湖广之冠。在古代社会，充足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肇始于北宋，历南宋和元末两个小高潮，至明洪武年间形成高峰的“江西填湖广”移民潮大大促进了黄州府的开发。随着水利的兴修和垆田技术的推广，至万历年间，黄州府“野无遗土”了。在赋税方面，早在明朝初年的洪武六年（1374），朝廷根据税粮的多少，将全国的府分为上、中、下三等，其中20担以上者为上府，黄州府为上等州府，可见黄州府在明朝初年就处于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而在此以前，黄州

¹作者简介：方正，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湖北黄冈，438000；程昊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²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诸子学史”（15BZW060）；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鄂东名人文化与区域发展研究”（201703402）；黄冈师范学院学科团队项目“鄂东名人文化研究”。

府一直是偏僻下州，在经济上也是下等州府。这种经济的发展体现在文化上就是黄州府进士的人数在湖北的所有州府中居第一位，高达 321 人，其中明朝前期 45 人，后期 276 人⁶。进士人数的变化反映了经济对文化发展的制约作用，鄂东财富的积累为晚明鄂东学术中心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文化世家的崛起是晚明鄂东学术中心形成的关键

据《中国文化世家·荆楚卷》统计，湖北湖南有 74 家“文化世家”，其中湖北有 32 家，而黄州府有 15 家，居第一，而这 15 家中，除了黄冈潘氏世家是宋代以外，其余十四家均为明清以后。实际上明代鄂东著名的文化世家远不止这些，如蕲州的顾（顾问、顾闳）、冯（冯天驭）、郝（郝守正）、李（儒）蕲州四大家，黄安—麻城的耿、梅、刘、李、田五大名门望族，黄冈王氏家族，罗田胡氏家族等，此外，蕲州还有李时珍家族，麻城还有周氏、董氏、赵氏、邹氏、熊氏等文化世家。鄂东文化家族通过占有土地和奴仆，实现了财富的积累，“楚大夫仆隶之盛甲天下，麻城尤甲于全楚。梅、刘、田、李强宗右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张里闾，其泰已盛”⁷。在社会安定，财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这些文化家族积极从事文化事业。

（一）兴办书院，养成学术流派

古代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至明代出现了会讲式书院。宋元以来学术流派的产生、学术成果的出版、学术思想的传播乃至学术中心的形成，都以书院为基地，因此，书院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所在地域的教育程度。据研究，明代湖北分府新建、修复书院共 114 所，其中黄州府第一，共 37 所，占全省 33%，其次是武昌府 25 所，荆州府 15 所，承天府 13 所，德安府 11 所，襄阳府 8 所，郢阳府 4 所，汉阳府 1 所⁸。在这些新建、修复的书院中有不少是世家大族所建。耿定向凭借其政治和学术上的巨大影响，与其弟定理、定力在家乡筑天台和天窝书院，造福乡梓。状元焦竑在《天台书院记》中说：“天台先生崛起楚之黄安，推明孔、颜、周、陆之学，与乡人肆习之，从游者履恒满户外。”⁹这种浓郁的讲学之风吸引了王学各派著名人物李贽、焦竑、何心隐、邓豁渠、管志道、吴少虞、周思久等来黄安，或定居，或讲学。据耿定向《里中三异人传》记载，何心隐、邓豁渠和方与时是活动在鄂东一带的三个异人。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是吉州永丰大族，家累万金，族众数千，从颜钧游，经常活动在湖北一带，曾多次到黄安寻耿定理，一住就是一年；邓豁渠又名邓和尚，师事赵贞吉（赵大洲），曾定居在黄安；方与时是黄陂人。又据李贽的记载，庄纯夫（李贽之婿）曾告我曰：“八先生（耿定理）云：‘吾始事方湛一（方与时），湛一本不知学，而好虚名，故弃之。最后得一切平实之旨于太湖（邓豁渠），复能收拾反听，得黑漆无入无门之旨于心隐，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复疑也。’”¹⁰庄纯夫是李贽之婿，在李贽赴任姚安知府的途中，寄养耿家三年，跟随耿定理左右，其言或许可信，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黄安耿氏家族的书院是一个文化生态场，王学各派人物纷纷前来切磋学问，极大提高了鄂东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又据湖北宿儒甘鹏云说：

有明一代，讲学之风最盛，大都宗主白沙、甘泉、阳明三家。就湖北言之，李承箕、李承芳、吴廷举、朱伯骥、曹璘，源于白沙者也。何迁、余胤绪、袁国臣源于甘泉，则白沙之再传也。蕲州二顾、黄安三耿，源于阳明者也。唐希皋师事钱德洪，张绪师事邹守益，刘承烈师事耿天台，则阳明之再传也。李若愚师事张甄山，则阳明之三传也。¹¹

蕲州二顾指嘉靖、万历年间的顾问（1510—1591）、顾闳（1527—1613）兄弟。顾问自幼酷爱读书，于嘉靖十七年（1538 年）中进士，先后任寿昌县令、贵州道御史、徐州兵备、浙江按察僉事、福建参政，所到之处，设义学，供贫困者免费就读，亲自讲学，在他擢升福建参政后连续九次上疏乞归，归里后建崇正书院，倡阳明学说；顾闳，顾问之弟，自幼天资聪慧，嘉靖二十九年（1550）二十三岁时中进士，曾任刑部主事、礼部郎中、南京吏部郎中、福建按察副使，与其兄顾问一起为官，一时传为美谈。兄弟二人，为官期间惜民力，恤民苦，设义仓，赈济鳏寡孤独和废疾者，为人恬静清检，蔬食淡泊，顾问有“茹菜顾公”“顾青菜之称”，顾闳则有“顾小菜”之誉，赢得“天下清绝，顾问顾闳”的赞誉。顾问在蕲州建崇正书院，顾问、顾闳共同建讲易庵于蕲斗山，并在泉湖之滨设讲堂，聚众讲学，生徒盈千，潜心著述。顾问著《日岩诗文集》《经说》《外集》《语录》等七种著作；顾闳著《五经发意》《通鉴补意》《楞严解》等十二种著作。罗洪先对“二顾”推崇备至，赞誉有加，“真圣人之徒也”。¹²在二顾主讲崇正书院时期，邀请天下名家讲学于蕲州：太仓王世贞，余姚王龙溪、钱德洪，南昌李材，吉安罗洪先，盱眙罗汝

芳，琼山海瑞，安福邹薄，丹阳姜宝，黄安耿定向、定力兄弟等。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为李时珍学习和写作《本草纲目》创造了条件，《本草纲目》最后能够刊行也得益于文坛领袖王世贞的序言和推介。

陈寅恪先生说：“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³学术的家门化和地方化在晚明鄂东特别明显，黄冈县的《礼记》学和麻城县的《春秋》学天下闻名。

乾隆《黄州府志》记载：“秦继宗，字西汀，万历甲午（1594）解元，庚戌（1610）进士，著有《礼记疏意》《纲鉴要略》诸书。”在乡、会试中，秦继宗的本经均为《礼记》，中湖广乡试第一名。秦继宗在《礼记》经上的造诣和科举的成功，为黄冈士子的科举考试树立了榜样，吸引了本地学者投身于《礼记》学的研究。通过对明代¹³科湖广乡试进行统计发现，在录取的84名以《礼记》为本经的举人中，32人来自黄冈县，约占38%，意味着每十个湖广乡试的《礼记》经举人中，有4个是来自黄冈；在黄冈县的56名举人中，以《礼记》中式者32人，约占57%。而且，从现存的《会试录》《登科录》及《进士履历便览》等资料中，我们可以找到黄冈县进士（或者会试中式者）名录40人，其中治《礼记》者28人，占70%，而不以《礼记》为本经的进士只有12人，仅占30%。这表明，黄冈县士子在会试中专经《礼记》的程度高达70%，远远大于《礼记》学重镇浙江余姚和福建闽县。这表明明代黄冈读书人多以《礼记》为本经，其在《礼记》经上的成绩不仅在湖广一省内远超其他诸县，在全国性的会试中也居于前列¹³，黄冈王氏世家的王一鸣言：“齐安（黄冈）介在江汉一隅，其人士皆生而好《礼》，起家于是者比比而是。”¹⁴作为文化世家的王家，在朱明一代贡献了10位进士，其中7人是藉《礼记》而高中进士的，占黄冈县28位《礼记》经进士的四分之一¹³，难怪崇祯年间大学士黄景昉说，明朝科举地域专经最著名的是江西安福的《春秋》和湖广黄冈的《礼记》，“迄今有安福《春秋》、黄冈《礼记》之目。”¹⁵我们可以说，《礼记》经是明代黄冈学子科举考试的专经，鄂东黄冈与浙江余姚和福建闽县并列为三大《礼记》学的中心。

上文提到安福《春秋》学闻名全国，实际上晚明鄂东麻城《春秋》学后来上，“敝邑麻，万山中手掌地耳，而明兴独为麟经藪，未暇遐溯，即数十年内，如周、如刘、如耿、如田、如李、如吾宗，科第相望，途皆由此。故四方治《春秋》者，往往问渡于敝邑，而敝邑亦居然以老马智自认。”¹⁶这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三甲22名进士、巡抚甘肃的梅氏家族又一文武双全的“楚中豪杰”梅之焕总结麻城科举成功的秘诀。麻城的文化家族，借助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大兴书院，以书院为载体，研习《春秋》学。通过对明代《会试录》的考察，从绝对数来看，麻城县以《春秋》经会试中式人数42人，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西吉安府的82人，若从相对数来看，安福县在这46科中有166名进士，以《春秋》经中进士84名，占比49%，而麻城在46科中有50名进士，以《春秋》经中进士42名，占比84%¹³，故晚明麻城进士李长庚说：“余邑《春秋》，其世业也。习是经者十人而九。”¹⁷梅之焕也说：“古亭以治《春秋》特闻。询之学宫，其经以《春秋》者十而九。阅楚录，其《春秋》魁以亭州者十而九；读题名记，其亭州第以《春秋》者十而九。”¹⁷这里的古亭、亭州皆为麻城的旧称。

王一鸣、李长庚、梅之焕是鄂东黄冈王氏家族、麻城李氏家族、麻城梅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晚明鄂东进士中的佼佼者，亲历者的话印证了晚明鄂东是天下《礼记》学和《春秋》学的中心。

（二）结社讲学，开展学术交流

晚明鄂东之所以成为天下《礼记》学和《春秋》学的中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世家大族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名家学者来鄂东讲学，鄂东结社讲学之风甚浓，正如黄宗羲说：“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于讲学，余妄谓过之”¹⁸。谢国桢先生说：“在明代末年，政治和社会里有一种现象：一般士大夫阶级活跃的运动，就是党；一般读书青年人活跃的运动，就是社。”¹⁹明代文人结社的基础是，“嘉靖以后社会经济极为繁荣”、“水陆交通便利”¹⁹；其直接原因是，“明代以八股取士，做八股的，须要识得风气，知道一时的风尚，文章才不至于落后”、“一般士子们聚合起来习举业，来做团体的运动就是社”。¹⁹社集的活动方面又分为三个时期：“嘉靖到万历初年的社集以文会友”、“崇祯年间社局，由诗文的结合而变为政治的运动”、“弘光

以后，而变为社会革命的运动”¹⁹。明中叶以后，“社风至盛，风习既开，多好以攻文讲学相结纳，诗文沿隆庆七子余波，讲学沿阳明后学。学会门分派别，声光炯然，皆当日声气翕集之效也。”²⁰晚明鄂东文人结社类型及其活动主要有诗社、文社、禅社、政治会社等，而冯梦龙和李贽是在鄂东结社讲学的典型代表。

上文已经说到，文社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当科举考试内容发生变化的时候，文章就要跟着变，就要研究诗文，揣摩文气，于是士人结成文社，相互研讨，交流制义见解。冯梦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麻城士人的邀请来讲授《春秋》。冯梦龙是当时研究《春秋》的名家，海内知名。他长期研究《春秋》，积二十年而成书。其弟冯梦熊《麟经指月·序》中云：“余兄犹龙，幼治《春秋》，胸中武库，不减征南。居恒言精覃思，曰：‘吾志在春秋。’墙壁户牖皆置刀笔者，积二十余年而始愜。”¹⁶在麻期间，冯梦龙与梅之焕、陈以闻等人组织过一个研读《春秋》的文社。1620年，冯梦龙编辑出版了《麟经指月》。冯梦龙在《麟经指月·发凡》中说：“顷岁读书楚黄，与同社诸兄弟，掩关卒業，益加详定，拨新汰旧，摘要芟繁，传无微而不彰，题虽择而不漏，非敢僭越居造后学之功，庶几不愧成先进之德云耳。”²¹他所指的楚黄，就是明代黄州府，也就是本文所说的鄂东。他又在《麟经指月·发凡》之后，将“同社批点”88人名单也列出，其中麻城39人，这39人都是麻城治《春秋》的学者，由此可以窥见麻城治《春秋》的盛况。冯梦龙不仅是《春秋》学的圣手，同时也是明代情才派的代表作家和文章大家，冯氏在麻城讲学，不仅提高了麻城士子的春秋学水平，而且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技巧，正如梅之焕所说，“蔽邑之治《春秋》者，迢迢反问渡于冯生”¹⁶。

“宋明哲学有三个里程碑，分别以‘天理’、‘良知’、‘童心’为最高范畴，而以‘童心’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正是李贽的创造”²²。而成就李贽的是鄂东的文化家族。隆庆六年（1572）李贽与耿定理（号楚侗）在南京第一次相见，便成至交。李贽在《耿楚侗先生传》中回忆：

岁壬申，楚侗游白下。余时懵然无知而好谈说。先生默默无言，但问余曰：“学贵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为是，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试看自信与自是有何分别？余时骤然应之曰：“自以为是，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不自以为是，亦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楚侗遂大笑而别，盖深喜余之终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后，思念楚侗不置，又以未得见天台为恨。²³

李贽与耿定理的初次相见可谓心有灵犀，在一问一答中展现了两位得道高人的才情与性情。李贽一生念兹在兹的是“胜我之友”，故于万历五年（1577）由南京刑部郎中出任云南姚安府知府途中取道鄂东，直抵黄安见楚侗，并得以拜会耿天台。李贽一家入住耿氏家族的五柳别墅。再次相见，李贽与耿定理更是深投契合，萌生弃官侨寓黄安之念。经耿定理劝说，李贽将女儿女婿留在耿氏五柳别墅，并与耿定理约定，三年后归隐黄安，与耿定理朝夕论学，“楚侗见余萧然，劝余复入。余乃留吾女并吾婿庄纯夫于黄安，因而约之曰：‘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俸禄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²⁴万历九年（1581）李贽三年期满挂印而去，直奔鄂东之黄安，入住五云山耿定理的天窝书院。同治《黄安县志》载：“天窝书院，即天窝山房，距城十五里，在五云山之巅，耿公恭简、仲子庸（即定理）讲学之处也。……温陵李贽侨寓于窝，所著《焚书》《藏书》《续藏书》半脱稿于其间。”《黄安县志》说李贽的《焚书》《藏书》《续藏书》半脱稿于其间，有掠邻县麻城之美，据林海权先生考证，其间李贽的学术著作主要有《老子解序》《庄子解》《读南华》²⁵。李贽在黄安只待了四、五年，而在麻城居住了十三、四年之久。李贽归隐黄安，主要是因为耿定理。万历十二年（1584）耿定理卒，耿定向担心李贽好超脱、不以嗣续为重而教坏耿家子弟。这看起来是耿李冲突的原因，耿定向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他的儿子耿克明久困场屋，不以嗣续为意。但从根本上来看，是李贽和耿定向学术理路和学术宗旨的不同，“卓吾寓周柳堂湖上。一日论学，柳堂谓天堂重名教，卓吾识真机。楚侗谓柳堂曰：‘拆篱放犬。’”²⁶但耿定向不同意周柳堂的说法，“夫孔孟之学学求真耳，其教教求真耳。舍此一‘真’，何以继往？何以开来哉？近日学术淆乱正原，以妄乱真，坏教毒世，无以绍前启后。若卓吾果识真机，认真自得，余家兄弟自当终身北面之，亡弟安忍如此引喻，置之篱外哉？”²⁷而李贽批评耿定向是假道学，两人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万历十三年（1585）李贽离开了黄安，徙居麻城。在麻城周氏家族的支持下，李贽到了麻城龙潭芝佛院，成就了他的龙潭伟业。

（三）出版学术著作，强化学术中心地位

学术中心的形成离不开学术文献，而标志性学术成果，彰显一个家族、一个地域的学术地位，同时也有助于强化其学术中心地位。随着明代中期鄂东经济的繁荣，文化世家的崛起，鄂东文献甲于全楚，“天下称文献上国莫如楚，楚诸郡莫如黄，黄诸邑莫如麻”。²《礼记》学著作、《春秋》学著作、《本草纲目》等可证明之。

乾隆《黄冈县志》云：“余心纯，字西涧，万历壬辰进士，授嘉善知县，研精《礼》学。著有《礼经搜义》二十八卷。初，邑孝廉于庭诤以《戴记》鸣世，心纯与进士樊玉衡、王一鸣、学博刘功远暨汉川中丞尹应先同受业焉，而心纯所著为尤显。”²⁸从中可以看出黄冈《礼记》学学脉传统，余心纯、樊玉衡、王一鸣、刘功远、尹应先等曾经问学于于庭诤，这批青年才俊先后考取了进士，在他们中间余心纯学问最好，有《礼经搜义》等传世，是《礼记》学的名家，“《礼经搜义》，余不佞未第时搜古今说《礼》家义，记之以成编者也。六籍惟《礼》最浩繁，训诂家人操一议，意见纷拏，殊难衡决。不佞深慨于中，以故搜集群言，稍加修订，有当于心者，辄笔之，宗传为约，直省诸负笈者翻阅苦耳。乃座师选部邹公倦倦以杀青属，仍洒鸿制冠篇端，成命俱在，义弗敢辞。顷家弟大若暨门下旧游士环中汪生辈亦颇致尺一于署中，相趣不置，爰出而授之书贾周氏。亦藉是以就正海内诸业《礼经》者。”²⁹从余心纯的自叙中可以看出他的《礼记》学源于他的启蒙老师于庭诤，他是在搜集群言的基础上，在家人和门生的帮助下，在他的进士考试时的老师邹观光的督促下，最后交给书商周氏来出版的。关于余心纯的《礼经搜义》在学术界的地位，黄洪宪在《礼经搜义序》中将其与徐师曾的《礼记集注》相提并论：“大概伯鲁之《集注》详于训诂，故浩渺而不为繁，公之《搜义》主于会要，故检括而不略，均有功于《礼经》者也。”²³明代黄冈第一文化家族王氏家族万历十一年进士王一鸣也说：“余先生敬若者，先孝廉友，时纨绔时业，已以治《礼》有声郡国间，为诸生祭酒。”¹⁴余先生敬若即为余心纯。

黄冈《礼记》学雄视天下的百年岁月里，除了余心纯《礼经搜义》外，秦继宗《礼记疏义》、陈鸿恩《礼记手书》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余心纯说六籍惟《礼》最浩繁，而《春秋》经可命题者不过百余条，则至简。麻城学者在研究《春秋》时则另辟蹊径。梅氏家族的梅国桢的儿子梅之焯以世家大族的身份研究春秋，撰写《春秋因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之焯字惠连，麻城人。是编专为春秋制义、比题、传题而作，每题必载一破题，而详列作文之法。盖旧制以春秋一经可命题者，不过一百余条，虑其易于弋获，因而创为合题，及合题之说纷纭淆乱，试官举子均无定见，于是此类讲章出焉。”³⁰梅之焯的《春秋》学详列作文之法，同余心纯《礼经搜义》检括学术路径不同。据吴宣德研究，明代近2万进士的试经中，本经为《春秋》的占8.6%，《礼记》为7.5%，《诗》经为34.6%，《书》经为23.2%，《易》经为25.9%。³¹可见《礼记》学和《春秋》学的艰难和艰深，但鄂东学人迎难而上，学术精进，这也是晚明鄂东科举兴盛的奥秘所在。

晚明鄂东的春秋学著作除了冯梦龙的《麟经指月》和梅氏《春秋因是》外，还有董天策的《春秋文稿》、刘守泰的《春秋心问》；黄安耿定向之子耿汝愚的《耿氏春秋》、耿定力之子耿汝恣的《春秋愍渡》《麟经古亭春秋世业》等。

如果说《礼记》学和《春秋》学是专门之学的话，那么万密斋的《万密斋医学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是百科全书式著作。《万密斋医学全书》共108卷，32册，70余万字，是继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之后我国又一部诊治医学集大成的著作。李时珍在编纂《本草纲目》时“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将文献考订和实际调查相结合。在文献研究上，上自三坟五典，下至文学传奇，博观慎取，所引用的医家书目，除旧本84种外，新增引据古代医家书目276种；自陶弘景、唐、宋以下所引据经史百家中的经史子集著作，除旧本草所引据的151种外，又新增440种。不仅如此，李时珍还向老农、渔夫、樵夫、猎人、乡村村妇学习，请教药物学知识，讨教单方、验方，经过实地调查和临床试验，验证药性，慎审结论，可谓有本有源，有体有用。《本草纲目》全书52卷，190余万字，共载药物1892种（实为1897种），新增药物374种，附图1109幅（实为1110幅），附方11096贴，其中8000余贴是李时珍所收集或研制，不愧为“东方药物巨典”。正如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所说：“毫无疑问，明代的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攀登到本草著作之顶峰的《本草纲目》。此著成书于1578，而问世于1596。李时珍作为科学家，达到了同伽理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隔绝的任何人所不能达到的最高水平。”³²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万密斋医学全书》实现了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临床辨证论治、药物学研究三者的耦合。李时珍的本草学、辨证论治和万密斋的临证

医学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鄂东成为明代中国医药学的中心。

三、鄂东成为晚明全国学术中心在时空上的影响

唐长孺先生在《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中说：“荆州之成为全国学术中心更重要的是对其他地区和今后产生的影响。”³³学术中心也可以说是文化重心之所在，“文化重心应指一个文化特别发达的区域，该区域的文化代表那一个时代的主要精神与中心内容，并对周围地区产生辐射式的影响。同时这种文化或为统治者所提倡，或在当时名流文士中流行”³⁴。那么，鄂东在晚明成为全国学术的中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呢？

第一，促进了鄂东地区人才的兴盛。黄冈《礼记》学和麻城《春秋》学虽然是一种科举化的经学，但在晚明读书人的生活中，科举考试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中心，差不多是他们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整个社会形成了以士绅为中心、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功名为中心的结构。从地域影响来看，据张建民研究，有明一代，湖北各府州县科举进士总计达 1119 人。全省八个府中，以黄州府中进士人数最多，达 321 人；其次为武昌府，为 232 人。若以县来计算，麻城第一，进士 100 人，黄冈第二，进士 87 人。³⁵根据《湖北历史人物词典》记载，宋元之世，黄州府（鄂东）人物占全省 12%，而明、清、民国之世则分别占 30%、36%、34%。可见，黄冈《礼记》学和麻城《春秋》影响到鄂东人物的兴盛，成为地方科举考试的专经，最后成为全国《礼记》学和《春秋》学的中心。从时间上看，黄冈《礼记》学和麻城《春秋》不仅影响到清代鄂东地区，清代湖北进士人数最多的仍然是黄州府，而黄冈县进士全省第一，达 122 人³⁵；而且，这种学风和文风影响到民国鄂东地区，产生了一系列大师级人物，如地质学家李四光、哲学家熊十力、政治史兼经济学家王亚南、语言文字学家黄侃、文艺理论家胡风、诗人学者闻一多、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哲学史家兼佛教史家汤用彤、方志学家王葆心等，他们都是鄂东人，均堪称某一文化门类独领风骚的一代巨子。

第二，提高了鄂东地区在全国的学术地位。龚鹏程在《晚明思潮》中提出：“晚明恐怕并不以阳明学为主要的思潮。”³⁶在其谨慎判断中或许有些道理，但其“公安派是在李卓吾童心说直接影响下，或以童心说为理论基础，发展出独抒人的自然情性、破除格套、反拟古、否定儒家文学思想的文学解放理论，实在是完全错误的”³⁶的论断，笔者不敢苟同。与李贽、公安三袁同时代的汤显祖说：“世事玲珑说不周，慧心人远碧湘流。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³⁷汤显祖此诗形象地讲述了李贽的“童心说”对袁宏道文学观的影响。万历十八年（1591）袁宏道来龙湖问学，住了三月有余，袁中道在《袁宏道传》中说：

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塾户，浸浸其未有涯也。³⁸

从袁中道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袁宏道在向李贽问学之前也存在模拟古人，深受拟古主义文风的影响，这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在“三袁”崛起之前，公安乃至湖北的文学还是很传统的，“吾邑自洪、成以来，科第不乏。士大夫之有行业者，亦复不少，独风雅一门，蓁芜未辟。”³⁹正是李贽的“童心”直接开启了袁宏道的“性灵”，“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强调诗歌是自己真实感情的流露，“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反对蹈袭模拟，“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主张向民歌学习，强调真诗在民间，“閭閻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³⁷。由此可见，李贽在鄂东倡导“童心说”催生了晚明的“公安派”文学，而“公安派”又影响到五四时代的思想与文学思潮，“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响，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 and 主张了”⁴⁰。李贽“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批判孟子“执一害道、神话孔子”的反传统思想；提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的高扬人的主体性的人文主义思想，反对“德礼刑政”对人的束缚和戕害，主张人的自由；反对禁欲主义，主张“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满足人的正常欲望等思想和主张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也从中汲取养料。

第三，代表了晚明科学技术的最高成就。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集“药效、药原、药理”于一身。南北朝以前，中国的本草学一直以来以总结药效作为基本课题；自陶弘景至赵宋，药物基原鉴别是本草学研究的重心；金、元以降，对药理探讨成为热门。但在李时珍之前没有哪一部本草学著作将三者有机汇聚于一书之中，只有李时珍完成了时代所赋予他的历史使命。《本草纲目》最早流传到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东方国家，对日本、朝鲜的医药学发展产生过直接影响。十八世纪，《本草纲目》传布到西方各国，西方学者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医学，对其矿物学、植物学和生物学也兴趣甚浓，被达尔文称赞为“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本草纲目》是鄂东的，也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

注释：

1 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71页。

2 毛凤韶：《麻城志略序》，《湖北文征》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6、436页。

3 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岭南学报》1950年第11卷第1期，转引自舒怀等：《中国文化世家·荆楚卷·总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4 本文所说的鄂东特指今天的黄冈市，明清时期的黄州府，而不是历史上的黄冈县。大别山以南，长江中游下段北岸，东经114°25′至116°8′、北纬29°45′至31°35′之间的广大地域。除了黄冈市所辖的黄州区、团风县、浠水县、蕲春县、黄梅县、罗田县、英山县、红安县、麻城市、武穴市、龙感湖管理区外，还应包括武汉市新洲区，基本上是明清时期的黄州府所辖地域，参见刘礼堂等：《鄂东文化的人类学考察》，《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1期。

5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09-313页。

6 章开沅等：《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4页。

7 吴伟业撰、李学颖点校：《绥寇纪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281页。

8 蔡志荣：《明清湖北书院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4页。

9 光绪《黄安县志》卷9《艺文·天台书院记》。

10 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2册《焚书注》（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页。

11 《湖北文征》“例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12 《湖广通志》卷48《乡贤志·黄州府》。

13 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0、174、181页。

14 王一鸣：《朱陵洞稿》卷21《职尺编》，清抄本。

15 黄景昉：《国史唯疑》卷3，康熙三十年抄本。

-
- 16 高洪钧：《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17、16 页。
- 17 光绪《麻城县志》卷 43《艺文志·序》。
- 18 沈之盈点校：《明儒学案序》，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7 页。
- 19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7、7、10 页。
- 20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0 页。
- 21 李廷先、田汉云点校：《麟经指月》，《冯梦龙全集》第
- 22 20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6-270 页。
- 23 许苏民等：《李贽、耿氏兄弟和公安三袁》，《江汉论坛》2009 年第 7 期。
- 24 同治《黄安县志》卷 10《侨寓》。
- 25 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8、134 页。
- 26 《明儒学案》卷 35《文端焦澹然先生竝》。
- 27 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 3《又与周柳堂》第十八书。
- 28 乾隆《黄冈县志》卷 8《儒林》。
- 29 余心纯：《礼经搜义·自叙》，明万历刻本。
- 30 林庆彰、蒋秋华、杨晋龙等主编：《经义考新校》(6)，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2 页。
- 31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 30《经部三十·春秋类存目一》。
- 32 吴宣德等：《明代会试试经考略》，《教育学报》2011 年第 1 期。
- 33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47.
- 34 唐长孺：《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 页。
- 35 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9 页。
- 36 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13-616、616-620 页。
- 37 龚鹏程：《晚明思潮》，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6、232-235 页。

38 钱伯城笺注：《袁宏道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669、187-188 页。

39 袁中道：《袁宏道传》，《珂雪斋文集》卷 9《妙高山法寺碑》。

40 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 10《送夹山母舅之任大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28 页。

41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 1995 年版，第 43 页。

42 陈鼓应等主编：《明清实学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8 页。